

10-13

文史资料辑存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常熟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yt90/32



6824

编 辑 说 明

一、本辑存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供编写地方史、志和历史研究工作者作参考，并推动文史工作的开展。所收资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辑存只在内部发行。

二、本辑存所收资料的期限是，上起清末，下止“文化大革命”结束。凡属这一时期有关常熟地区的自然、社会、人文等方面的资料，不论体裁，均所欢迎。

三、本辑存编辑者对来稿可以选择、摘录、删节或作结构上的调整和文字上的修改。

四、欢迎所有读者，对本辑存所载资料，提出补充、订正或质疑；对编辑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文史资料辑存第九辑

目 录

关于建立常熟党组织的回忆·····	李 强 (1)
我活动在大江南北的交通线上·····	曹文忠 (5)
地下运输线及短篇三则·····	陶 然 (14)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在我县参加 革命活动的见闻·····	张廷圭 (20)
九死一生记·····	鞠巧生 (55)
宋庆龄同志关怀虞山镇少年之家·····	陆上贤 (69)
瞻仰鲁迅先生遗容的回忆·····	归 含 (76)
常熟教育概况(清朝末年——抗日战争以前)·····	庞翔勋 (82)
解放前常熟县立初级中学概况·····	季良生 (93)
常熟县立初级中学创办的头三年·····	庞翔勋 (117)
私立中山中学——一所多事的学校·····	季良生 王琳元 (138)
我们的母校——常熟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	程有庆 朱善余 (147)
丁氏小学回忆·····	王耕英 (149)
前归义乡建立学校的回忆·····	金瑞生 (152)
人物画家吴石平·····	唐瘦青 (156)
解放初期我县工商界的筹粮支前和献粮运动·····	周士敏 (161)
常熟璆源煤油五金百货店店史 ·····	顾鸿希整理 陈士超校核 (170)
记商办常熟电话公司始末 ·····	邹毅斋 曹辛建口述 杨秉仁整理 (182)
读者·作者·编者·····	(192)

关于建立常熟党组织的回忆

李 强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那时候，我正在上海南洋路矿学堂读书，加入了国民党。在南洋路矿学堂成立了上海市第四区党部第十七区分部，我任常务委员。当时，第四区党部内的国民党员中，有右派，也有左派；如石克士就是右派，朱义权就是左派。我加入了国民党，就积极参加了左派活动。

“五卅”运动时，作为南洋路矿学堂的代表，我天天去上海学生联合会开会。不久，就由上海大学代表郭伯和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加入青年团以后，即被派往曹家渡区工会第五办事处搞青年工人运动。当时，该区党的负责人是陈祝三同志，团的负责人是瞿景白同志，工会第五办事主任是江元青。八月，瞿景白同志离开上海去苏联学习，青年团组织成立一个部委，我任团部委书记；同时，也即转为中共党员。参加团部委的有现任浙江省政协主席的毛齐华，任宣传委员；组织委员记得是曹国宾，两人都是当地的青年工人。一九二六年初，过了阴历年，我被改派往团浦东部委书记，宣传委员是李伯钊同志。到了夏天，我又改任为团吴淞部委书记。到任没有多久，组织上又调我去制造炸药、炸弹等军火物品，为秋冬间组织暴动作准备，归罗亦农同志领导。这时，我就不搞青年团工作了。罗亦农原来是党的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我在一九二五年底就认识了他。

党的江浙区委成立，罗亦农任区委书记。他找我谈话，要

我回到常熟去发展组织。当时他还派了一些人到外地去搞建党工作。我记得陈云同志是被派到青浦去的，陈仰山同志是被派到绍兴去的，还派了哪些人出去，现在记不得了。

我接受任务后，就回到常熟，住了一个时候，找到了原来已是党员的周文在同志，又发展了王耕英、曾雍孙两人，建立了中共常熟特别支部。当时江苏省委还没有成立，共产党员侯绍裘、尹介眉虽然到过常熟，但没有建立过党组织；我也曾到苏州去找过许金元，谈起建立党组织的问题，后来也没有下文。中共常熟特支，是在罗亦农派我回常后建立的，所以，这个特支是归江浙区委罗亦农直接领导的。

特支建立起来后，又发展了邹逸中。我们经常上党课，学习党的纲领、性质、任务，还有党的组织纪律等等。不久，我就回上海去了，周文在也回了上海。根据罗亦农的指示，我把常熟特支的工作交给王耕英负责。临行时，我还把一些宣传品交给了王耕英。

暑假期间，我带了几枚手榴弹又回到常熟，同曾雍孙去北门外桃源涧练习实弹爆炸。这次返常，检查了特支的工作。他们曾出版过一期《警报》，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活动欺骗、麻痹人民，侵略瓜分中国，因而遭到了一些信教学生和地主势力的非议和指责。王耕英顶不住，把交给他的宣传品统统丢到尚湖里去了。我批评了他，他就声明退出组织。于是，仍由我接管了特支工作。但是，我们和王耕英的友谊还是很好的，他虽然已经没有组织关系了，对我们的工作还是很支持的。

从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起，至一九二七年四月止，这段时间，我主要在常熟活动。其时江苏省委仍未成立（最近我听说，中共江苏省委是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后的五、六月间

成立的），特支仍属江浙区委罗亦农领导。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第三次武装暴动胜利后，我曾去过一次上海，找到了罗亦农，汇报了常熟特支的工作。他告诉我，党的方针是扩大力量，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他还指示我要发展党员，扩大组织，并给了我不少宣传品，让我带回常熟。

我回常后，常熟特支的工作，主要是推动筹建国民党县党部，迎接国民革命军（即北伐军），同时，发展了党员，扩大了党组织。

国民革命军一到常熟，我们的活动就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邹逸中是国民党常熟县党部的主任委员，我们的工作大都是通过他出面去做的。钱宗灏、顾近仁等负责工人运动，钱宗灏还负责学生运动。我们张贴了不少“为周水平烈士复仇”的标语，发动反封建斗争。在农村里，建立了三个国民党的区分部，成立了农民协会，反对土豪劣绅，也搞得很火热。国民党常熟县党部公开后，曾推举我为常熟县县长，但遭到了驻军六十三团团长陈诚的反对，经过几次洽商争论，决定成立“常熟县临时行政委员会”，由地方开明士绅钱南山为主席，我为委员。钱南山是钱宗灏的父亲，对我们的工作，是同情和支持的。陈诚那个团里有两个共产党员；其中有一个曾来找过我，后来我介绍他到贺龙的军队里去，曾和我一起参加过南昌暴动。我在常熟，还曾介绍过不少人加入共产党，但是，他们的姓名，都记不起来了。

不久，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我奉命于四月十四日离常去武汉。因为邹逸中的面目并不太红，与新军阀的关系比较热络，所以，我便把党的工作交给了邹逸中。

我去武汉前，曾雍孙到上海，找我谈了常熟的情况，我要

他回去负责将党的组织活动转入地下。从此，我和常熟党就没有直接发生过关系了。

一九八一年初夏

（转载《常熟革命文史资料》）

我活动在大江南北的交通线上

曹文忠

潜入常熟 隐蔽活动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调动数百万军队，先后向我各个解放区发动进攻。一九四六年七月，毛主席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我人民解放军立即展开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原在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我党我军人员，根据“双十协定”的规定，大部分已撤往苏北。当时留守在苏南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力量，是很薄弱的，而国民党则乘我北撤之机，大力加强了他们的统治，一面封锁长江，切断南北交通，一面强化保甲制度，搜捕我党武工队及地下工作同志。苏南是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为了加强苏南地区的斗争，牵制敌人的进攻，我党组织“江南办事处”，陆续派遣力量，由苏北潜回苏南，积极开展敌后斗争。我们这一批偷渡过江的有十位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由组长樊秋声、副组长吴鹤带领，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从苏北东台一仓出发。出发前，任天石同志和我谈了话。当时国民党军队已向东台和盐城进攻，气焰十分嚣张。我们由武工队交通陆小康同志护送，避过敌人据点，来到苏北长江口岸大明港。当天晚上就登上了预先准备好的小木船，刚想登船，忽然发现敌人一艘气艇由远而近驶来，木船只能暂避不动，待汽艇去远后，木船才驶入长江。船至我县高浦口，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我们一个

个都跳入浅滩走上了岸。上岸后走了八、九里路，经过小市附近，绕道到达一户独宅基人家，那时已是十点左右。这家人原来是个积极分子，在敌人的威迫下，曾办过自首手续，但政治上还是靠拢我们的。根据组织上要我任交通的意见，故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其余九位同志另去别地。

这家人家就是夫妇两人。我们进村时，一路上狗叫得很厉害，生怕伪保长第二天来搜查，他们夫妇二人商量决定在天不亮之前将我送走。次日清晨四点左右，他把我送过了小市。我一个人经白岩桥、梅李直至赵市滕王庙横浜陆大兴家，在那里一进门就在他们房间内耽搁了一天，白天不敢出去，到了晚上，才悄悄地来到朴家巷我妹妹家。朴家巷离我父母家很近，但也不敢直接回去，因敌人正要捉我，怕连累家属，所以我先在妹妹家住下来。我父母知道后，晚上跑来看我，他们认为我在妹妹家也不保险，决定把我转到另一个姐夫家中去。这个姐夫的家在西陶舍的转水墩上，三面环水，比较偏僻，很少有人到那里去的，我就在那里隐蔽了下来，直到后来，苏常太负责人陈刚同志派陆建中同志来约我去任阳见面，我才离开那里。

大约是在十月二十日左右，陈刚同志从苏北回来，就叫陆建中同志来联系，当天我在那里见到了陆建中同志，陆约我次日去任阳与陈见面。第二天，由陆建中带领一起到任阳，先在李市乡下住了一夜，在那里碰巧见到了卫旭东，他是坚持在江南打游击的，后被敌人捉去，刚刚放出来。他没有看见我，我也不敢去招呼他，怕出毛病。这天夜里，我到了白米浜的一家人家，见到了坚持在我县领导敌后武装斗争的陈刚同志，他与我谈了江南的斗争形势和今后的任务，要我担任中共苏常昆太工委政治交通员。因为我的有利条件是：在江南基本上没有暴

露面目，便于在白区活动；我会做竹器，可作掩护并以此作为独立生活的来源。政治交通工作的任务很重要，党的信任和委托，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表示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惧。同时在场的还有一位女同志，后来才知道她也是搞政治交通的。因为立脚点尚未安排好，陈刚同志要我去上海隐蔽一个时候，并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带二个同志一同去上海，一个叫章建中，一个叫王再兴。临走时给我三元伪币，作为在上海的生活费。这样，我就带了他们两人离开白米浜来到任阳，又从任阳走到昆山，三人都没有证件，好容易在昆山上了火车，到达上海。

在上海，先住在肇嘉路徐炳生家中，徐是靠拢党的积极分子，他的父亲和弟弟同我们也相处得很好。因为房子小，住不下，我们就在附近搭了一个棚安身。在旧社会，上海很多“白相人”专以敲诈勒索为生。怕他们来找麻烦坏了大事，我们凑了一些钱“孝敬”他们，才初步安下身来。往后生活怎么办？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买一些毛竹，由我来做竹篾、竹针，由章、王两人上街去卖。可是他们都不是做买卖的人，不会做生意。做了卖不出去，正在发愁，恰巧父亲来沪探望我，他愿意相帮一起去卖，从此打开了销路，生活才算有了着落。

二个月后，上级调走了章建中，接着又调走了王再兴，在这期间，组织上派他们从苏南往苏北解放区联系工作，敌人非常猖狂，到处捉我们的同志。章、王二个调走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章建中离开上海先回常熟，组织上派他到苏北解放区联系工作，他与大明港的王大姐一起乘海船到灵甸港，一上岸，就碰上了还乡团，被抓住杀害。王再兴同志离沪回常，先在武工队，之后组织上派他送情报去苏北，不幸在江阴渡口被敌检查抓住，他在危险之中机智地把组织上给他带往苏北的密

信吞入腹中，不料为敌人发现，惨遭剖腹而壮烈牺牲。

机动灵活 完成任务

一九四七年三、四月间，我奉令回常，到古里新桥新友米厂以担任帐房为掩护，开展活动。这家米厂实际上是组织上投资的，化了十担米钱，又凑了一些股金，由钱全全同志负责米厂工作。我当帐房，只是挂个名，主要是搞交通工作。我经常去的地方是常熟城里，那里有宋以天等同志在敌人心脏秘密工作，又及时把情报带回乡下，交给陈刚同志。有时还要去苏州江东日报社找归行肇同志，去上海找徐姚本同志，去福山港口找王似丹同志等。

在这期间，敌人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十分猖狂。敌后斗争，也很紧张，敌人天天在乡下“扫荡”。伪保安大队长张琴，是个十分阴险毒辣的家伙。他针对我们武工队活动的特点，经常在晚上派遣便衣特务武装，分成小股，在我们活动地区流动伏击。他们的花样很多，有的专门到积极分子住地听壁脚，有的冒充新四军上老百姓家敲门打听新四军消息，或是上伪保长家吓唬人（当时我们曾利用过一些伪保长为我们工作），有的假装钓鱼、钓黄鳝，在水陆交通要道处设暗哨。我们稍一不慎，就要上当受骗。

我们也摸清了敌人的规律，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群众掩护下，敌人成了瞎子，我们是亮眼，敌人抓不到我们，而他们安插在我们心腹之地的坏蛋，一个个被我们揭露和打击。张琴暴跳如雷，索性出动大部队，一个村子或几个村子围起来进行大搜捕，抓不到共产党，就翻箱倒笼，抓鸡捉鸭，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搞政治交通工作，纪律是很严格的，一点也不能马虎，否则就会危及组织和个人。其纪律是：1.不准发生横的关系，即使在路上碰到熟悉的同志，也不打招呼；2.不准和工作没有关系的人（即使熟悉的）谈论地下组织情况；3.不准拍照片；4.在任何危急的情况下，不准泄露党的机密。

传达情报，一般是采用两种形式：一是口头传达；二是书面传达。书面传达的方法又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方法是用钢笔把情报写在很薄很薄的拷贝纸上，字体细小，火柴壳那么大的纸，可以写上一、二百字，然后把它卷起来，塞在衣服贴边里，夏天衣衫单薄，塞在贴边里容易摸着，就塞在香烟中段，或是塞在粉瓶底部，或是塞在原封饼干匣内。还有一种方法是用水汤水或白矾水把情报写在白纸上，送到后用另一种方法显形。记得一九四七年夏天陈刚同志要我去常熟城里长乐茶馆接关系交换情报，那时，天气很热，我穿了纺绸长衫，戴了草帽，还戴了黑眼镜。陈要我一手拿二包饼干，一手拿一把纸扇，并告诉我对方也有一样的二包饼干，暗号是手摸额角头，嘴里说“热来”。我一到长乐茶馆，就看到了在茶台边坐了一个人，身旁放了二包饼干，我就走到他身旁，摸了摸额角头，就说“热来、热来”，他见了我，也摸摸额角头，也说了句“热来”。暗号对上了，我就坐下来，泡了壶茶。当时我看到旁边还有几个我认识的同志，我没有招呼，因为这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我吃了几口茶后，这人就站起来走出去了，我就跟了出去，一直跟到南门大街，到了人少的地方，我们就交换了一包饼干，随即各走各的路。当时我们的情报都放在饼干包中，我的饼干包中藏有陈刚同志的密信，我取回的饼干包送到乡下，马上就交给了陈刚同志。

在农村传送情报，由于情况千变万化，有时对方不能按时

到达约定地点，就带来了住宿问题，市镇客栈不能去，这会暴露自己，农村中不是关系户，也不能随便住，加上敌人到处抓人，群众也害怕招留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经常在露天过夜。记得在一九四八年二月，那天，正是农历大年夜，天很冷，组织上要我送信到任阳白米浜去，走到那里天已黑了，因为我们约好到陆家的，有人来接我，到后一问，他们说钱康元同志刚刚已经来过，那里的群众告诉他不能久留，他没有等着我，就先走了。因为前几天包厚昌同志带领的武工队就在那里和敌人打了一仗，敌人捉了不少群众去，形势很紧。这时天色已黑，又不熟悉地形，远处又传来了人声和狗叫声，如果再行动，估计路上有危险，我就把资料塞在陆家柴罗中，当晚就在船坊里的草堆中过了夜。隔了七天，到农历正月初七，我又到了那里去，情报还没有取去，那天正下着毛毛雨，又冷又湿，漆黑的夜晚，陆家不敢留我，他们把我从白米浜送到曼塘塘，因我这地方只到过一次，群众不熟悉我，也不敢留我，当晚我只好在地上草堆中渡过了一夜，第二天才离开。

敌人侵入延安时期，也是我们这里最紧张的时刻，我们晚上行动要听狗叫声和伏在地上听脚步声。我也不能宿在人家家中，组织上就专门为我买了一只小划子船（那时已离开新友米厂），白天我骑自行车出去联系工作，晚上就划了小划子船到芦苇丛中过夜。因为没有固定的地方，划到哪里就宿到那里。而敌人却在疯狂地搜捕我们，他们到处张贴布告，以二百担白米的代价，悬赏捉拿陈刚同志。有一次，敌人便衣武装在白茆塘边乡下与我武工队的一个小组发生遭遇战，季元福、陆二男等三同志不幸中弹牺牲。敌人在他身上搜到了陈刚同志的私章，就误以为是陈刚同志，一面请功领赏，一面大事宣传，真是丑态百露，出足洋相。

那时的交通工作，除了传送情报，还要经常把同志从常熟带往上海，或从苏北带回常熟，这些同志大部互不熟悉，要以对暗号接线。有一次，组织上要我带一位同志从常熟去上海，约定地点在本县小东门外五老峰航船码头，暗号是我一手拎包饼干，一手拿一支棒糖，嘴里还要吃一支棒糖。来人暗号是手里提一只篮，篮里有一顶西瓜皮帽，帽子是摺扁的。我按时前往，航船靠岸后，果然见到一个年岁蛮大的人，手中提了一只篮，篮中有顶摺扁的西瓜皮帽。他来了我也不理他，马上往前走，他就在后面跟着我走。我把他带到汽车站，自己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车票，他也马上买了一张，一起上了汽车。到了上海后，他才告诉我要去的那一家旅馆，我就领了他去，这就算完成了任务，我就回来了。

敌人一方面在农村流动“扫荡”，一方面推行严格的保甲制度，实行联保切结，颁发国民身份证。凡是遇到包围搜查，过卡过哨，成年人都要出示身份证，否则就要被扣留拘捕。我们的武工队员，既没有户口，也没有身份证，给活动带来一定的困难和危险。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我们就派宋以天、李志祥、王忠等同志去搞身份证白片。我们通过城区秘密工作同志的关系，搞到了一批国民身份证白片，身份证上需要刻印的伪县政府县印、钢印和乡镇保甲印等各类印章，都有钱宏同志模仿刻制，自制的伪县印和真的一模一样，但钢印开始不能制造，我们就利用敌人疏忽的机会，由打入敌人心脏的同志到伪县政府去偷盖，以后党组织通过其他方面的关系，照样自造了一枚钢印，关于身份证问题，就顺利地解决了。

危急万难 百折不挠

一九四九年春天，江南即将解放的前夕，为配合我军渡江

南下，中共苏常昆太工委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要把两份敌人的江防工程图和火力防御图送往苏北。敌人当时自知末日来临，除了吴淞口外，把沿江所有港口全部封锁，妄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我大军南下。我本来打算二月份在我县花庄耿泾塘出口渡江到苏北，并由组织上拿出金戒子一只和好几十米钱买通了驻在花庄的敌军连排长，将船放行。这天深夜，我和另外三人在耿泾塘上把船偷偷地摇到江边，刚要出港口，就碰上了敌人的巡逻兵，差一点被扣留，只得把船摇回来，躲在范家塘再等机会过江。那时大家心里很着急，直到三月二十日左右，组织上派陆振志同志来联系，要我改道从上海去苏北。我们先到了上海吴淞口，组织上派船到吴淞口来接我，一夜之间就顺利地到了苏北青龙港。次日一早，一上岸看到渡江部队云集港口，人来车往，热气腾腾，真是高兴得没法形容，快活的热泪直滴。当天我就赶到白蒲，把情报交给了九地委负责同志，并向李凌、陈刚、钱伯荪、浦太福等领导同志汇报了苏南的斗争情况。白蒲是渡江干部的集中地，一个小镇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同志，个个精神饱满，信心百倍，我在那里住了三、四天，听了一个报告，回来时，组织上要我带回一批党的文件和宣传资料，指示江南的同志积极开展工作，迎接大军南渡。

那时长江早已封锁，木船偷渡，随时都有被击沉的危险，通过当地党组织，我乘上了吴大郎的木船，船上装着豆饼，完全象一条搞运输的生意船。船在白天出的港，离岸才十多里，突然发现崇明岛方面冒出两艘敌人的炮艇，火速向我们冲来，形势非常危急，船老大掌着舵，只见他两手直发抖。我只是安慰他说，还远着呢，要他镇静。他说不行，敌人有“长筒子”（指敌人的火炮）我们忙把船向太平港口靠拢，吴大郎夫妇一个劲地叫我和陆振志同志快跳入江中，躲避炮火，还说：“你

们还年轻，还要为革命干工作，不要白白牺牲，快跳下去。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只得依从船老大的好意，拿起文件和作为地下活动费用的十多两黄金，跳进滚滚的长江中，向芦苇滩游去。当我们将文件、黄金放进芦苇滩，敌艇的机关炮就接连不断地打过来，木船的一侧在密集的炮火中连中三弹，一时硝烟弥漫，水花泥沙在周围飞溅。幸亏远离江岸七八里处有个暗沙岗，敌艇开不过来，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炮，只得悻悻离去。我和陆振志同志就奔到江边，只见吴大郎夫妇安然无恙，但船身已被打了三个窟窿，到涨潮时，我们顺着潮水将船推到港里，赶紧把船修好。三天之后已经是三月三十日，我们乘原船从太平港出港，这一次航行，我们的船一直靠岸行驶，不料第二天早晨，又被老鼠沙附近的敌艇发现，并接二连三的向我们打机关枪，同时在高音话筒里叫喊要把船停下来。敌我相距仅四里多路，我鼓励老大沉着掌舵，冲过去就是胜利。那时刚巧顺风，我们就与敌人巧妙周旋。敌人向我们开机关枪时就落半篷，装作停船样子，其实仍借助风力还在行进。我们的人则躺在舱面上，防备敌人继续打枪打炮。那时，正巧后面青龙港里又出来三条木船，敌人发现了更大的新目标，就转而向他们开枪开炮。就在敌人不向我们开火的空隙，大家动手，扯足全篷，木船飞速向前，摆脱了敌艇，很快到达太仓浏河港口，混进了那里的渔船群里，然后我们仍走原路驶向吴淞口，为了避过敌人检查，我在半途登上了岸，买了一听饼干，把文件、宣传品放在饼干桶内，安全回到常熟，完成了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几天以后，从城市到农村，到处出现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纪律和党的工商业政策等传单，大大鼓舞了群众，加强了同敌人斗争的信心和决心，稳定了各界人士，动员了各方面的力量，为伟大的渡江战役作出了应有的贡献。